

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作用——以逆全球化叠加新冠疫情为背景

杨权 赵樱娜 吴扬扬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加之 2019 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使得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严重受挫,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发达国家为主的“逆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增速下降、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日渐边缘化、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矛盾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凸显了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大国霸权、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失衡、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困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理念为导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构、缓解国际公共品供需失衡问题、推进全球治理的公平性与普惠性,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起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在发展融资、流动性救援、多边贸易体系等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逆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

引言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新兴经济体则迅速复苏,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为转移国内矛盾,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失业率上升、社会两级分化等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甚至将矛头指向中国等新兴国家,采取了各种反全球化的措施,掀起了“逆全球化”潮流,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接二连三的“退群”、英国正式脱欧、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等。加之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各国政府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使得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陷入停滞状态,进一步助推了“逆全球化”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及治理体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日益凸显,全球治理机制亟待完善。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和治理方案,每一步都是朝着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治理的方向前进,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正朝着高质量发展转变,“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福利不仅仅体现在沿线国家通过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帮助项目等政策项目获得的收益，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补充，它打通了亚欧非国家的通道，将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打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不平等地位的现状，秉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发展。

一、逆全球化的本质及表现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然而，经济全球化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历程中不乏“逆全球化”的现象。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如加征关税、出口管制、技术壁垒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渐逆转，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寻求或建立具有排他性的区域合作协定，如TPP、TTIP等。“逆全球化”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无论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时期还是其后以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发达国家始终控制着全球治理体系。作为现阶段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G20不仅标志着全球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还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从本质上来讲，全球化是顺应市场的，而“逆全球化”是扭曲市场机制的，包括限制商品、服务及各种要素的流动。因此，“逆全球化”成为了发达国家转嫁国内矛盾、阻碍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争夺全球治理领域话语权的重要一环。

（一）发达国家转嫁国内矛盾和危机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均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体现了资本的逐利本性。为缩小生产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特性，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而造成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此外，伴随着借贷资本、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深入发展，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主线。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脱实向虚”，造成资本和生产分离，也进一步导致了经济泡沫的产生和国内制造业的衰退，甚至引发了国内经济、政治等危机，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将危机和矛盾的产生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认为是市场的开放导致本国经济受到冲击。基于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全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力倡导制造业回流，试图通过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来转嫁国内矛盾和危机以及改变当前利益受损的局面。

（二）发达国家政治失势的表现

“全球化”曾是发达国家制定世界经济运行规则，掌控全球治理体系的策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和规

则制定权逐渐被削弱，与此同时，新旧经济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的优势亦逐渐丧失。发达国家为保障既得利益，维护其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主导权，试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扭转这一局面。从另一方面来讲，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意在借助“逆全球化”这一手段，实现对新兴经济体的打压，阻碍新兴国家的崛起。例如，美国所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为了减少中美贸易顺差，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试图通过贸易手段遏制中国技术崛起，打压中国向制造强国升级，这亦从侧面反映了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担忧。

（三）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经济全球化在给发达国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等问题，为各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增添了极大的难度。一方面，当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为发达国家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并未重视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问题，导致“全球化”红利集中在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加剧了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因低收入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并不能适应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变化，亦无法参与到跨境流动中，加之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外移，低收入群体的就业空间被压缩，其所面临的失业风险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为缓和社会矛盾，平息国内群众的不满情绪，发达国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倡导制造业回流等“逆全球化”主张，以改善国内现存的社会问题。

二、逆全球化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

在“逆全球化”浪潮盛行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相对经济实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逐步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向兼顾发展中国家转变。图1展示了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2008-2019年平均GDP增速对比，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而主要发达国家则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此外，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商品、服务及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及英国脱欧、美国挑起贸易战等均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成了阻碍，亦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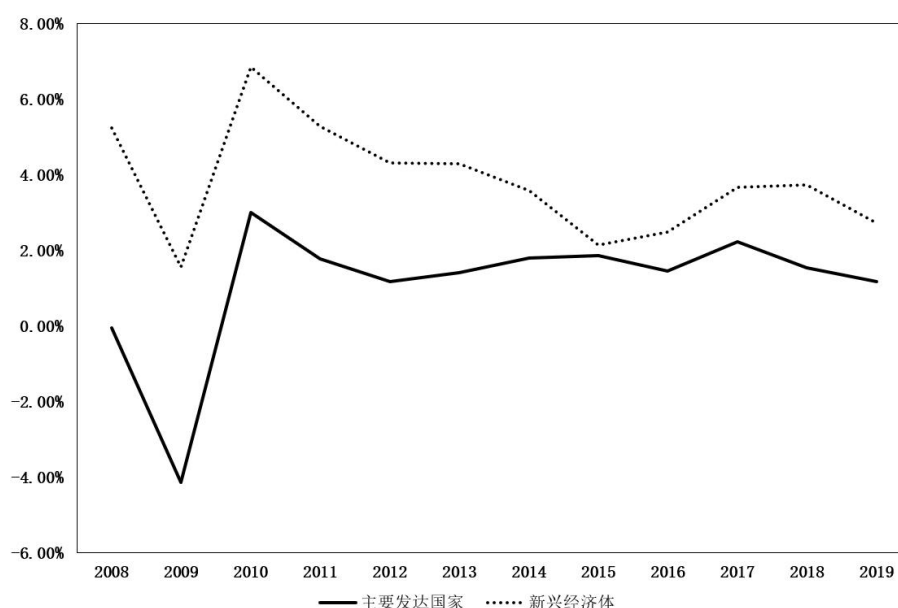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 GDP 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一）全球贸易投资增速下降

自西方发达国家推行“逆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投资增速下降趋势愈发明显。联合国发布的《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受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2018 年全球贸易增速从 2017 年的 5.3% 放缓至 3.6%，远低于预期。在此背景下，贸易已难以发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2.3%，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使得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陷入停滞状态，进一步导致各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除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降外，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下降了 42%，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的 2009 年还低 30%。

（二）多边贸易体系日渐边缘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主要推动者，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国际贸易体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分歧，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议题一直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区域合作协定作为其推动“逆全球化”的政治工具，以追求更高贸易、投资标准为借口，将发展中经济体排除在外，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割裂，亦阻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三）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矛盾加剧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无疑会对要素的跨国流动形成

阻碍,甚至会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和冲突的产生。此外,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其工业化程度尚不完善,综合实力较为薄弱,仍需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甚至需要依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促进自身发展。然而,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各种“逆全球化”策略,阻碍了各国之间贸易、投资、金融等的交流和联系,使得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全球化中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本就存在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三、逆全球化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

二战后世界长时期的和平带来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其中,亦离不开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二战后,为维护全球经济秩序,重构全球治理框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成立了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组织与机构。时至今日,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三驾马车(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世界银行主要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推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意在建立一个以公平竞争、互惠等为原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全球治理体系也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及美国优先等策略的出现破坏了全球治理机制,凸显了当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亦让我们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 大国霸权

当前,世界经济霸权仍处于美国霸权时代,由美国主导着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秩序。然而,美方作为霸权国,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起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责任,还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挑起贸易战,对其他国家进行恶意制裁,严重阻碍了世界经贸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仍由美元主导。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他们对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拥有更多话语权、提升国际地位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承诺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但其并没有放权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仍不成比例地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极为不利。

(二) 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在全球治理中,向国际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大国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是大国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加之霸权国责任缺失,在对外政策中奉行“本国优先”,近年来各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导致在全球治理中出现公共

产品供需失衡的问题。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全球治理机制仍缺少足够的支撑力量,使得部分国家在享受全球治理成果的同时而不承担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造成“搭便车”问题突出,这必然会导致“治理赤字”,最终每个国家的利益都会因此受损。

(三) 治理机制碎片化

治理机制碎片化本可反映多极化的国际权力格局,拓宽各类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渠道,然而,受“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却呈现出了制度失灵的现象。当前,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因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而停滞不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WTO的治理能力持怀疑态度,开始将目光转向区域治理机制。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选择或创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带有排他性的区域治理机制,导致新旧制度共存,治理机制呈碎片化特征,甚至会带来治理失序、制度失灵等问题,若不能建立协同的治理机制,全球治理机制将变得复杂且不稳定。

四、“一带一路”的推进及其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中的“一带”它既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实体,而是具有中国国别性质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软机制”,它的本质是成员间国际经济一体化,即是将古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商业文化纽带作为平台,以此维系亚欧非地区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是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朝着新的阶段发展,且高质量发展对于“一带一路”来说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经与15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与42个国家建立了投资合作工作组,此外还建立了14个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并且中国还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相互市场开放,发挥综合性和专业性平台的作用,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贸易促进活动,为沿线国家提供更丰富更多的合作机会。虽然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一带一路”展示出强劲韧性和生机活力,但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应该继续保持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但这一高质量发展不是复制“一带一路”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而是需要遵循共商、渐进与义利观原则,并且以此为前提,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支持体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传统的全球产业链治理理念已经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发展,一味的高效率已经无法承受与缓冲重大事件带来的冲击,现在需要产业链保持效率与安全并存,从而使得在之后全球各国各产业链能够应对裕如未来可能出现的同等危机。而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中,中国坚持将产业链向区域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其发展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基础设施投融资,我国坚持推动我国企业各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走出去”,同时企业以投资为纽带与沿线国家企业进行国际产业合作,同时为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下发展中国家提供跟广阔的国际视野,提高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发挥各国在原材料、劳动力、服务、技术等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拉动沿线国家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并且“一带一路”发展一直秉持着中国社会发展“义利合

一”的发展理念，坚持“互利互赢”的发展观，积极推进“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理念为全球经济格局注入了新能量，它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真正的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有利于优化全球经济格局和完善全球经济的治理。

五、“一带一路”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致力于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加深区域合作理念，并以“一带一路”为载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近八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截至 2021 年 1 月份，中国已与 17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渐增强，全球治理体系亦面临着巨大挑战，然而，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立场，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构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地暴露了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亦凸显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完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方面，“一带一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亚非欧等众多国家，通过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区域化程度得到有效提升，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是为了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而是对以美元为中心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有益的补充和完善，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打破当前国际货币被发达国家垄断的现象。此外，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了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不仅提供了多边的区域性投融资平台，缓解了沿线国家面临的融资瓶颈，而且有助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构，推动治理体系的有序发展。

（二）缓解公共品供需失衡问题

公共产品供需失衡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尚不完善，中国利用自身资金、技术和经验优势，致力于推动设施联通，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如中欧班列、雅万高速铁路等均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效，不仅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推动了区域的联通，带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展开，更重要的是其缓解了全球治理体系中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的问题。

（三）推进全球治理的公平性与普惠性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在实体经济的助推下迅速复苏，在世界经济的

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崛起已成为历史趋势和发展必然。然而,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发展中国家亦未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公平性、普惠性明显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构建了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平台 and 经济发展环境,同时也推动了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除了共建基础设施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贸易畅通,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亦推动了沿线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积极推进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将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重塑全球化新格局。

六、“一带一路”区域治理机制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作用

全球治理体系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构成的,不依赖于政府的强制执行力的机制、规范和活动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加速开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等都被紧紧链接在一起,全球经济体系中某一微小局部的扰动都可能会引发蝴蝶效应,给全球经济都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灾难。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治理机构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该三者常常被称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三架马车。就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演变成了全面的全球性危机,全球政治、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各类组织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发放贷款、贸易管制、关税减免等。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也推动和发展了一些区域性经济治理的新机构和新机制,例如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这些都对现行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进行了很好的补充。

(一) 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建立之初一直遵从非歧视原则、差别待遇原则和协商一致原则,但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一直推崇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并发动其他发达国家一起,这一举措对以 WTO 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在拜登入主白宫后,联合七国集团(G7)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业链,并建立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美版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尽管该方案名义上是“改革世贸组织”,但根本上是通过意识形态将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贸易进行分割,只是将美国自己的规则变成多边贸易的规则,本质上破坏了世贸组织推崇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美国、欧盟和中国对于世贸组织的改革都做出了相应的方案,将中国方案和美欧方案进行比较,中国的改革方案首先坚持世贸组织的三大基本原则,并且中国对待多边贸易体系的态度一直处于一个积极的状态,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贸易机制。具体表现在“后疫情时期”“一带一路”的高速发展下,中国自贸试验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和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各项业务繁荣

发展,并通过建设联通欧亚板块,链接非洲板块,突破了区域经济从而巩固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一带一路”通过打通欧亚通道,进一步加深多边贸易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相关优惠鼓励政策,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经济地位,从而增强多边主义的治理框架。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一原则同样被世贸组织所接受并推广,且这一原则被称为是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黄金法则”。“一带一路”秉持这一原则努力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的传统“全球化”,尽最大努力挖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新型发展之路,从而修复被美国“单边主义”冲击的多边贸易体制。

(二) 对全球流动性救援机制的补充和完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向各国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以及确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作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执行机制,担任着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职责,且IMF的主要通过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来协助成员国,帮助落后的国家指定完善的制度政策,以及快速应对危机和挑战。但尽管IMF经过了多次改革,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仍然被发达国家控制,新兴经济体在IMF的话语权依然没有得到提升,并且在经过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等重大事件之后,IMF陷入资金规模不足、对需要援助国家的救援不及时困境中,并且贷款条件对于某些需要援助的国家来说无法达到,这一现象表明IMF没有尽到维系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作的职责,或者认为IMF在应对如今的危机和挑战时,原有的制度和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现时的要求,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符合全球金融经济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1. “一带一路”发展对IMF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和份额被发达国家把控,因此形成了“强者主控”“实力决定利益收益”的市场化逻辑,但实际IMF提供的许多流动性救援本质上属于国际公共产品,从交易本身来看发达国家并未从中获得直接收益,但IMF以及许多发达国家提供的双边贷款常常伴随着附加的条件,例如对受援国内部的政治干涉等,使得非发达国家的部分主权丧失,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从而使得国际金融体系脱离了世界经济现实。而目前“一带一路”的发展目标已经从“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上升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即是将国家与国家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利用各国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差异互补,各自赋予各自的责任和所可以获得的利益,在取得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利益,从而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2. “一带一路”发展对IMF能力建设的完善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重要职责是为受援国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但IMF现存的筹款捐助模式已经难以维持IMF的资金来源,导致援助的效率大大下降,并且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需要援助的国家比例大大增加,资金更加不充足,从而IMF的能力建设受到巨大阻碍。因此IMF首先需要扩大资金池,无论是扩大IMF本身的资金池还是和其他组织、金融机构的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传统的金融产品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全球日益增

长的资金融资需求,需要创新产品的供给,从而更好的为全球金融合作服务。而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好符合当前全球金融发展的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存在不少关于区块链、人工智能、云支付等高新技术项目,这为全球金融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能够有效的加速全球资金池的扩充。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地区技术援助中心(Regional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Center, RTAC)作为能力建设的一个成功模式,使得一个地区的需求能够更加快速的获得技术援助,将资源集中起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缩短资源运输的地理距离。而 RTAC 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援助国、国际机构和地区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国开行已累计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项目发放了 2600 亿多美元的贷款,积极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为该地区的技术进步提供资金支持,对 IMF 的 RTAC 进行完善。并且截至 2021 年 1 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从 57 个增加到 103 个,投资金额达到 220.2 亿美元,同时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成立推出 130 亿美元危机恢复基金,致力于全球经济复苏,从而缓解了 IMF 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放贷款援助受影响国家的压力。并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以及货币互换协议签订,增强了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潜在外汇储备的可能性,从而增加货币流动性来缓解相关国家可能会出现的债务危机。并且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能够缓解 IMF 的资金不足的困境,释放 IMF 的压力。

(三) 对全球发展融资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世界银行(WB)作为战后以维护世界经济增长和稳定为目标目标的全球发展融资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一成不变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全球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疫情爆发等重大危机之后,相应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世界银行而言,其治理核心问题在于投票权的分配,各成员国的投票权除基本票以外,还需要根据各国认购的股份计算,这一规则实则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设置了一个隐形的“规则门槛”,使得许多触及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的事务无法自己做主,只能听从发达国家的计划,遵循发达国家的措施,以至于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尽管自 2010 年起世界银行在投票权方面积极进行改革,但改革进行非常缓慢,并且没有真正落实。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在世界银行的垄断地位,还有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严重不足,所以世界银行的改革迫在眉睫。针对由于发达国家主导而出现的种种限制,为改善该现状,“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下的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都在治理机制上进行了创新,首先在投票问题上对比世行的发达国家主导,亚投行坚持平衡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坚持设置投票权红线,增强弱小国家的凝聚力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但亚投行本质上还是处于“供给者主导”的模式,即是根据银行本身的标准制定发展战略来寻找合适的项目合作机会,而金砖开发银行则打破传统,开发以“需求者主导”的新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更直接的反应借款国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资金更合理的利用,这与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主导的现状完全不同。

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世界银行中无法取得地位提升的根本原因在于,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地位,技术进步空间小,基础设施建设

不完善，在许多领域被发达国家排斥在市场之外，无法参与国际高端产业链的发展，进而无法提升本国实力，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而“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不以设置规则门槛为前提，为沿线国家提供平等的双边或者多边合作贸易平台，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贸易，而是将国内外贸易联通，打造更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世界银行和其他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没有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帮助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且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困难问题恰恰是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举措通过为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支持，特别是亚投行，虽然目前相比较于世界银行实施的项目较少，但其项目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填补了世界银行能力和资金规模的缺口，激发了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得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在全球产业链得到提升，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升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利起到了推动作用，平衡了世界银行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的局面。

On the Ro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Improv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COVID-19

Yang Quan, Zhao Yingli, Wu Yang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In addition, the spread of COVID-19 worldwide since the end of 2019 has severely frustra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growth of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has slowed down, the global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eveloped and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ntensified.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anti-globalization"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defects of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l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highlighting the dilemma that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s facing, such as the hegemony of great powers,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China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always adhere to multilateralism, advocating to build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and with the "win-win"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guidance,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eas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s, promoting a fair and universa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BRICS Development Bank and Silk Road Fund, established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have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areas such as development financing, liquidity assistance an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Key words: Anti-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